

百岁名流

百岁将军的真情世界 「布衣天人」的红色之恋 理论与人生一样能接受时间的磨炼 被上帝遗忘了的「汉语拼音之父」 「胡子将军」的铁骨柔肠
文坛武将寿长情更长 「世纪诗翁」其人其诗 革命一生真情不薄 永远的「红色大姐」

吴志菲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K820.7/43

2008

百岁名流



吴志菲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岁名流/吴志菲编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
ISBN 978—7—80199—863—7

I. 百… II. 吴…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②老年人—保健—基本知识 IV. K820 R16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8767 号

书 名: 百 岁 名 流

作 者:吴志菲

责任编辑:一 青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68mm×230mm 1/16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18.75

印 数:1—6000 册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9—863—7

定 价:3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目 录

- 107 岁陈翰笙:动了 107 年脑筋的“中国经济首脑” / 1
- 103 岁夏征农:而今百岁从头迈 / 16
- 102 岁吕正操:百岁将军的真情世界 / 32
- 102 岁雷洁琼:百岁大姐最喜欢的头衔是“教授” / 45
- 102 岁王恒升:让燃“煤”之急不再燃眉的“院士寿星” / 67
- 101 岁陈琼英:“布衣夫人”的红色之恋 / 79
- 101 岁巴金:文比人长寿 / 91
- 101 岁苏步青:“几何爷爷”的立体人生 / 112
- 101 岁薛暮桥:理论与人生一样能接受时间的磨炼 / 128
- 101 岁周有光:被上帝遗忘了的“汉语拼音之父” / 146

100 岁孙毅：“胡子将军”的铁骨柔肠 / 172

100 岁萧克：文坛武将，寿长情更长 / 184

99 岁臧克家：“世纪诗翁”其人其诗 / 203

99 岁薄一波：革命一生，真情不薄 / 218

97 岁刘英：永远的“红色大姐” / 232

97 岁张光斗：“当代李冰”全接触 / 242

97 岁文怀沙：49 公岁的“活屈原” / 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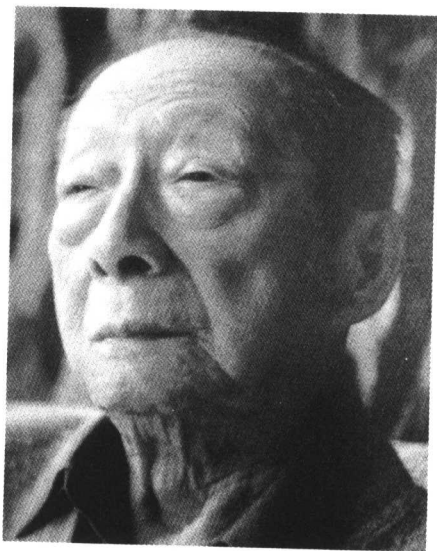
97 岁王定国：有一种精神叫“长征” / 271

107 岁陈翰笙

动了 107 年脑筋的“中国经济首脑”

陈翰笙档案盘点：

陈翰笙，原名陈枢，著名农村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问题专家，有“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与“当代经济学家之父”之称。1897 年 2 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21 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 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美国纽约《太平洋季刊》副主编、《远东通讯》主编、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霍普斯金大学国际问题研究



陈翰笙先生

所研究员、中国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名誉顾问、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编、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建设》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

研究所名誉所长、亚洲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中亚文化协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等，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协和医院七楼的一间病房里，静静地躺着一位依靠鼻饲吃些半流质食物而维系生命的老人。老人的眼睛早已“一清二白”（青光眼加白内障），看不见了，耳朵也不太灵了，必须大声说话他才听得清楚。一般人不会想到，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大师陈翰笙。尽管这位跨越三个世纪的老人记忆力明显地减退了，但他用了 107 年的脑子还是那么清楚。

于光远先生曾这样评价陈翰笙：“现在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现在活着的资格最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活着的最老的学者……”也有人称陈翰笙一是革命家，二是外交家，三是学界泰斗。对于他的生平和贡献，这几个头衔还远远不能概括。毕竟他的经历太独特，他的阅历太丰富，他的人生太传奇！

（一）总理边切蛋糕边向经济学大师祝“茶寿”

2004 年 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行专程来到北京协和医院，亲切看望经济学界的泰斗——陈翰笙，向病床上的老人祝贺 108 岁（虚岁）寿辰。

“总理亲自为老人切开蛋糕，还称呼老人为茶寿。”陈翰笙的外甥女童瑜琼与老人在一起生活了 25 年，回忆起温家宝看望陈翰笙情景时这样说。让童瑜琼想不到的是，看望了老人后，总理拿出了准备好的蛋糕，而且准确地说出了老人的年龄——“茶寿”。“茶字的草头代表二十，下面有八和十，一撇一捺又是一个八，加在一起就是 108 岁！”童瑜琼说，真没想到总理竟然连这点细节都想到了。“‘陈老茶寿很难得，我们来给他祝寿！’总理一边说着，一边拿出准备好的蛋糕，并且亲自切开蛋糕，分成多片。”

“别看老人没什么表示，但他心里清楚得很。”童瑜琼说，当时总理看望陈翰笙的时候，陈翰笙虽然不能说话，但神志一直很清醒。“我趴在他



孙幼礼、孙稚礼、孙小礼等四姐妹向姨父陈翰笙祝贺100岁生日

耳朵边喊，他肯定听到了。”让童瑜琼如此相信的理由是，大年初一的时候，她一家子到医院给老人拜年，跟老人说话的时候，老人的嘴不停地动，想说话。

陈翰笙没有子女，夫人顾淑型女士因患癌症也早在1968年11月去世。“老人家的身体以前好着呢！”童瑜琼说，从1979年开始，她就和老人家住在一起了。

2002年2月，陈翰笙因为呼吸道感染住进医院。协和医院的医生称，老人现在呼吸比较困难，必须依靠呼吸机，但健康状况相对稳定，没有大的危险。童瑜琼称，老人虽然是知名社会科学家，但生活极为简朴，而且也很容易相处。

在总理赞赏老人的话中，童瑜琼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陈翰笙老人一生桃李满天下”，因为老人平生最自豪的也就是这一点。“一生当中，老人家就喜欢教书研究，也喜欢和学生聊天。”童瑜琼说。

人们可能还没太注意，我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几乎多半是无锡人，像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姜君臣、秦柳方、张锡昌、王寅生、杨荫

溥、薛葆鼎等经济学界的巨擘，都是无锡人。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根源呢？要说原因，除了无锡是现代社会经济开化和发展较早的工商业城市这一地理因素之外，也与被称之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的陈翰笙出生在这里、活动在这里有着直接的关系。

据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说，两位被尊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的陈翰笙先生和薛暮桥先生，原来还有一段师生缘。薛小和说：“父亲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另一方面是 20 世纪 30 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陈翰笙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薛暮桥跟随他从一开始就是脚踏中国的农村，从调查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扎扎实实地研究问题。薛小和称，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的职位已比陈翰笙老先生高许多，但凡是与陈翰笙老先生一起开会时，薛暮桥先生绝不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笙老先生坐中央，而且张嘴讲话，第一句肯定是：“陈老是我的老师。”

（二）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与李大钊的神交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1897 年 2 月 5 日），陈翰笙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兄弟姐妹八人，他是老大。幼年就读于无锡东林小学，后随父母到长沙，就读于爱国人士创办的明德中学，受同盟会会员、南社诗人、历史教师傅荣湘的思想影响很深。1915 年母亲看他才智过人，变卖首饰送他去美国深造。

到了美国，先考入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种菜、养鸡等劳动。1916 年夏考入洛杉矶波莫纳大学，原想选读植物学科，因视力差看不清显微镜下的观察物，改学地质学，同样看不清地形地质图。一年后，接受导师卫斯特加德的劝告，改学欧美历史，并协助导师阅卷，假期出校打工得点收入。

1920 年毕业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任助教。那时，俄国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陈翰笙很想找机会去看一看，便抓紧机会学俄文。这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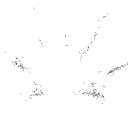


1919年5月陈翰笙(后排右二)在美国波莫纳大学与同学合影

后来去第三国际工作准备了条件。他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以《五口通商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题，写成硕士论文，论述“五口通商”后，中国的茶叶主要由广州出口，而产地则分布在浙江、福建，从产地运到广州，主要靠人搬运，一般要由几批挑夫分段运输，在漫长的路途上，茶商、挑夫常年络绎不绝，因此，沿途的饮食业、旅店、商店和各种手工业也都迅速发展起来。论文获得一致好评，并授予他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中国留美同学会秘书长，编印《中国留美学生》季刊等一些社会活动。

1921年冬，美、英、法、德、意、日等国为对远东和太平洋殖民地半殖民地势力范围再分配，在华盛顿召开新的分赃会议，北洋政府派出以顾维钧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留美同学组成后援会监督和声援代表团，阻止他们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他是这项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同年，同龄的无锡乡亲顾淑型也在美国学教育，将要毕业，两人相识后，志同道合，遂结为夫妇。后因在报上发现有同名者，他正式改名为陈翰笙。

1922年春，得奖学金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学习东欧史。是年秋，因德国马克贬值，为使手中所有的少量美元能维持夫妇俩较长时间的学习生活，遂改赴德国，他进柏林大学史地研究所，随奥托赫契教授研究东欧史，顾



淑型攻读德文。1924年夏,陈翰笙以《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为题的研究论文,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秋,蔡元培去欧洲考察,邀请他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陈翰笙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后又在法学系讲授美国宪法史,当时他才27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蔡元培主持北大,实行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不同学派和政治观点都可以上讲台,陈翰笙是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在北京大学教课时,上课铃一响完,他就开始讲课。他不紧不慢,娓娓道来,那速度使学生刚刚能记下笔记。下课铃一响,他刚好讲完,从不拖堂。学生复习他讲的笔记,字字玑珠,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堪称一绝。

在北大任教期间,陈翰笙参加胡适、王世杰等创办的《现代评论》。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积极参加北京学生声援运动,上街游行。并向李大钊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李大钊告诉他:“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还是先参加国民党好。”就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后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中国共产党内有七八十年党龄的同志即使还有也是廖若辰星,但是由李大钊介绍入党的已没有其他人健在了。正如李铁映在一次讲话中所言,陈翰笙是中共健在的最年长的党员之一。

1926年3月18日,北京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的革命运动,李大钊领导了这次斗争,陈翰笙和夫人顾淑型带领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这次游行受到反动政府军警的镇压,发生震惊中外的大惨案,当场被打死的学生47人,重伤300余人。陈翰笙夫妇幸免于难,他根据现场看到的情况,撰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

惨案次日,段祺瑞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和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成员躲进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使馆。陈翰笙仍经常与李保持联系,并经李大钊介绍,认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以及俄专教师格里涅维基。受他们的影响和启发,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发展情况。李大钊还介绍他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并为第三国际在柏林出版的《国际通讯》撰写英文通



讯稿。

这年冬，北伐军打到长江，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电邀陈翰笙、王世杰、周鲠生前往武汉任外交部顾问，协助政府办理收回武汉、九江英租界。不久，应李大钊电召回到北京。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0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杀害。这时的陈翰笙处境危险，遂偕同刚由莫斯科学习回国的夫人秘密离开北京经由日本去苏联。

(三)“中国农村派”论证中国的半封建社会性质

抵达莫斯科后，陈翰笙在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刚成立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20年代末，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生争论，当时主持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写了一本《中国农村经济》，把争论引向高潮。马季亚尔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认定中国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马季亚尔讲的只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中国农村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中国共产党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已经指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通过这次大争论使陈翰笙深深感到，由于对中国农村经济缺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讨论问题时没有确切有力的材料足以说服对方，因而萌生要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责任感。



经济学大家陈翰笙

1928年5月,陈翰笙夫妇回国,蔡元培有意邀他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由于王世杰反对,只好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审定《万有文库》有关书稿。1931年商务出版英汉对照的《百科名汇》,其中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和宗教部分就是由他审定的。他还挤时间就中国农民捐税负担问题,广泛搜集材料,加以统计分析,写成《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长篇论述,以充分事实,阐明中国的财政负担差不多都放在农民身上。这是他早期关于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要文章之一。他还根据西欧、东欧、俄国、日本的社会发展过程,分析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包括赋役制、强役制、工商制,并具体分列出它们的异同,为研究封建社会的农村经济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知识。

此外,中国20世纪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西北大旱,各种灾害频仍,豫、鲁、陕、甘等省农民大批向东北流亡,陈翰笙对东北的土地农民问题,也搜集材料写专文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刊出。

1929年,蔡元培正式邀请陈翰笙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学组工作;为减少阻力,蔡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陈接任后,鉴于所内图书资料极为缺乏,就答应铁道部部长顾孟余之请,兼任铁道部顾问,以其兼职月薪充实图书资料。同时开展社会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第一个调查目标,是上海日资纱厂的工人生活,揭露纱厂实行包身工制度下,包身工人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中国包工头的双重剥削。他将调查材料编成小册子,这就引起代表卖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某些人的不满,促使他转向农村经济调查,实现他在莫斯科工作时萌生的愿望。陈翰笙的农村经济调查,从江苏无锡开始,再扩展到河北保定和广东。其用意是,“江南、河北、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我们能够彻底了解这三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为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

1929年春,农村经济调查团在无锡成立。1930年又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调查中,陈翰笙发现,农村中计算土地面积的“亩”差异极大。陈翰笙指出:“根据无锡22村1204户调查,



知道无锡的所谓亩，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种，最小的合2.683公亩，最大的合8.957公亩。工业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中国，不可能有统一的度量衡，这样复杂的差异，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以浮收地租。”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他又组织对广东农村的经济调查，这次调查得到宋庆龄及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等人的支持，进行得很顺利。调查人员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共同组成。首先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进行详细调查，历时三个半月；而后用一个半月时间对番禺10个代表村的1209户进行挨户调查，同时还进行50个县335个村的通信调查。陈翰笙根据调查结果写成《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指出：“劳动力在广东这样不值钱，而全省可耕而未耕地竟占陆地面积的15%，兵灾匪祸更使已耕的田地很多被荒弃。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香港、广州、汕头等处的银行、银号中堆积着大量货币资本而不能用到农业生产上去。这便是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的背驰，乃是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更体现着这个矛盾的深刻。解除这个矛盾，然后可以使可耕的土地尽量地开发，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用，可投放的资本大批地流转于农村，这样，农村的生产关系便能改善，而农村生产力也会必然提高。这样，中国今日的农村便不难从危机中挽救过来。”

陈翰笙通过对中国各地的农村调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纯粹的封建已成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是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者均以农民为共同剥削目标。”后来，他更明确地认定：“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

1933年8月，他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在会上提交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他利用各地调查材料说明土地分配不均，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广大贫下中农无地少地，遭受地主富农残酷剥削，使农业

生产力低下,农村经济贫困现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路线,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重视,认为《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是权威之作。

1933年,为团结广大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者,陈翰笙与吴觉农、王寅生、薛暮桥、孙冶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被推选为理事长。次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持,发表了许多关于农村问题的论文、调查报告和农村通讯,对当时关于中国农村问题各种形形色色的谬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陈翰笙始终非常关心会务的发展,每个时期提出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

(四)在列国“游学”后尽心尽力效劳祖国

陈翰笙被迫离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后,不能在国内公开活动。1933年冬偕顾淑型东渡日本,继续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用一年时间写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两部著作。1935年4月回到上海,再度秘密去莫斯科,任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并协助苏联出版社校订俄文中国地图。

1936年4月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纽约出版《太平洋事务》季刊,陈翰笙应总编辑欧文·拉铁摩尔之邀,与夫人取道欧洲去美任编辑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连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去加拿大走访了十几个城市,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心和力量,通过各地华侨与华人组织,号召华侨与华人捐献支持国内抗日战争。

1939年陈翰笙移居香港,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工作,帮助组织建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宋庆龄是名誉主席,陈翰笙是执行秘书。当时所有从海外来的捐款都通过“工合”分发到抗战后方和解放区。

1941年12月,日寇占领香港,陈翰笙经澳门转到桂林,除继续进行工合工作外,还发表了《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物价与中农》等论文,并与张锡昌、千家驹等八人共同写成《战时的中国经济》一书。

1944年3月重庆国民党政府密令桂林西南行营逮捕陈翰笙。他事先得到消息，秘密离开桂林前往印度。他在印度德里大学找到一份评论员的工作，借此机会结识了一些印度学者，并把精力用在撰写我国人民抗日战争英勇事迹上，还将他和刘洪进、刘述舟在西双版纳对傣族原始公社的土地所有制调查材料加以整理，写成《西双版纳的土地制度》一书。



陈翰笙：我思故我在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陈翰笙等转到印度史学会工作，对印度进行经济区域考察，东至加尔各答，南到印度洋海岸，西到孟买，北到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信德，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调查，使他对印度经济地理、社会状况、种姓制度、宗教等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1946年4月，他和顾淑型离开印度前往美国西海岸，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约教授，讲授印度史。这时，正值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美国各地进行公开演讲，抨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唤起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华人的同情和支持。

1950年，有人带信给寓居美国的陈翰笙，说周恩来总理希望他回国工作。于是陈翰笙排除一切阻力，于次年1月底绕道欧洲返回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周总理在中南海设宴为陈翰笙夫妇洗尘。席间总理说，自己兼任外交部长，工作很忙，希望陈翰笙先生能助一臂之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陈翰笙说：“总理啊，您今天请客是用中餐还是西餐？吃中餐要用筷子，吃西餐要用刀叉，我是个筷子料，请不要把我当刀叉使，还是让我去做点研究工作吧。”当时在座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听到陈翰笙想做研究工作，便想到学术气氛和环境最好的北京大学。大概陆定一考虑，像陈翰笙这样游学、活动于许多国家，为革命事业做过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再怎么也得担任个领导职务，于是就说：“要么你到北大做副校长，帮



马寅初的忙。”但陈翰笙也推辞了。之后，陈翰笙去上海专门拜访了马寅初，说明自己并非不愿帮他的忙，只因自己是个“不善于办事”的人。后来周总理便聘他为外交部顾问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从陈翰笙已有的工作实绩看，他做外交部副部长是很称职的。但他的抉择是两个“最优”：一是自身最优，他认为做官不是自己为国家作贡献的最优选择，因为做官不是自身的优势，做学术和办具体事情很在行；另一个他认为在外交部有比自己能力更优的人，为什么要占据那个位置“发挥”自己的相对弱项呢？这样既耽误自己，又耽误别人，还耽误了国家的事业。因此陈翰笙在“做官”问题上抉择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理性判断和考虑国家需要的务实精神基础之上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曾对宋庆龄讲，要办个对外宣传的英文杂志，请她推荐合适的人选，宋庆龄立即就说：“陈友仁本来要找陈翰笙办报的，就用他好了。”后来周总理又亲自对陈翰笙说起办杂志的事，陈翰笙说那要有一批人，让金仲华打头，他可以帮忙。于是陈翰笙就去上海找金仲华，请他牵头办报，做编委会主任，自己做副主任。一次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客宴上，潘汉年问陈翰笙：“办杂志，你为什么不做主任，而让金仲华去做呢？”陈翰笙说：“金仲华一直是办报的呀，办杂志比我强。”陈翰笙解放前在国内国外都办过杂志，这次奉总理之命要办一个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的重要杂志，他便立即想到了最佳的牵头人选，而自己则不为名、不为利，自愿脚踏实地做事。后来他出访数十个国家，每到一处都关心《中国建设》的发行情况，并听取各方意见，尽最大努力把这份杂志编辑好、发行好。

(五) 淡泊明志的长者甘当义务家庭教员

回国后，陈翰笙夫妇长年住在东华门大街 25 号一个古老破旧的院子里。他们住在朝西的三间东厢房里，冬天相当寒冷，陈翰笙经常穿着棉袄在家里工作。夏天，东屋西晒，非常炎热，陈翰笙经常打着赤膊，汗流浹背地工作。陈翰笙虽是副部级领导干部，但他并未享受相应的待遇，也未曾想去争